

步著歷史的軌跡探索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的問題

鄭麗敏

Uncovering Some Problems in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by Following the Footstep of History

Li-min Cheng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not being recognized as a profession and som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Since Melvil Dewey founded the first library school in 1887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have persisted, these include confusing the objectives of a vocation with those of a profession, no consistent course contents in teaching, and the duration for study being too short. Fundamental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hilosophy, not much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imbalance of practice and theory in the education program, are yet unresolved.

What are the causes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Librarians and library educators together have to figure these out from the library history, and seek solutions. If we can't be sure of our objective, whether moving to professional model or academic model, and discard vocationalization totally, then we can never achieve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前 言

美國圖書館學校一個接一個的暫停招生或宣告關閉，樂觀的人說圖書館學校將再度以嶄新的面貌呈現，悲觀的人說圖書館學校將從此不再出現。但是我們所看到不該只是它的表相而已，圖書館學校的關閉是否意味著它的經營已不合實際的需求？是否象徵著已有其它可以取而代之而且更理想的羣體存在？是否間接的否定其對學術上曾有所貢獻？是否更證實圖書館學從來不是一門學域(field)？有太多太多的問題讓我們想去一探究竟。

自從 1887 年杜威(Melvil Dewey)創辦了第一所圖書館員訓練學校至今，除了 1960 年代的全盛時期之外，圖書館學校及圖書館在社會上或各個機構內的重要性，以及圖書館員的地位，一直令人感到沮喪。圖書館學教育和圖書館專業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但是百餘年來，不管是來自本身的衝突、掙扎或是自省，兩者之間的矛盾及錯綜複雜的關係，似乎未曾停止過，也從來無法達到共識，到底問題出在那兒？

早在杜威於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創立圖書館學校之時，就遭到學院內教師反對的聲音，兩年後(1888年12月)，這個歷史最短的圖書館學校被迫「關門」(註一)。此一現象和當今圖書館學校遭到關閉如出一轍，為什麼一向十分注重採用新技術來解決圖書館學問題的學校，卻在高度科技化及科際整合的 20 世紀末遭受到接二連三的示警？

大多數的圖書館員及從事圖書館教育者並未能從歷史中讀出正確的訊息，筆者在「圖書館史」這門課中，首次認識了屬於我們圖書館員的歷史，深深感到有必要從先人走過的路中去探究事實的真相。幾所極為著名的美國圖書館學校關門了，賴鼎銘老師認為，圖書館學術與圖書館員的本質性問題才是主因(註二)，促使筆者希望藉由探討歷史的事件來解開心中的疑惑，到底圖書館學教育所走過的路有那些可議之處？也希望藉由這些反思，提供看事情的不同面向，讓我們回顧過去走過的路，是否走對了？

一、從圖書館史上幾件重大事件談起

圖書館學教育的歷史學家通常把圖書館學教育的歷史分成三個明顯的階

段，一是 1887 年以前學徒式及在職訓練時期，一是 1887 年到 1923 年杜威模式之圖書館學校，第三階段是 1923 年「威廉森報告」(Williamson Report) 提出以後，朝向學術發展的圖書館學校(註三)。杜威及威廉森(Charles C. Williamson)，這兩位代表著實務與學術兩種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在不同的時期分別影響了圖書館學教育的發展。回顧圖書館學教育的歷史，就讓我們先來看看幾件由於他們而引發的事件吧！

(一)第一所圖書館學校的成立——技術化及實務化的起源

1887 年 1 月，杜威在哥倫比亞學院創立了圖書館經營學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有人將之視為第一個圖書館學校(註四)，有人則認為這只是圖書館員受正式訓練之始，在大學中設立的第一個圖書館學校應該是 1897 年伊利諾大學的圖書館學校(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of the Univ. of Illinois)(註五)。但無論如何，杜威把圖書館員的培養導向正規而有系統的教育訓練，這是不容否認的(註六)。杜威為什麼能夠在學院內的圖書館設立訓練學校？創立這所學校的目的何在？杜威的人格及特性對於這所學校造成什麼影響？杜威訓練未來圖書館員的方式，對於日後的圖書館學教育產生什麼影響？讓我們透過歷史學家的詮釋來看看杜威吧！

杜威在 19 世紀圖書館界，以創立了十進分類法(註七)及第一個圖書館訓練學校而聞名。一個世紀之後，在大多數圖書館員的心目中，他仍然如同當年忠誠追隨他的「學徒」之看法一般，象徵著崇高而有理想、實際而有效率。但是圖書館史的學者在透過史學觀點去追索真相時，卻有不同的看法。杜威只強調技術而不重視知識內涵，常被視為是導致今日圖書館及圖書館學校實務走向的主因，影響日後一百多年來整個圖書館學校教育的發展。筆者亦不認為應該把今日圖書館學教育的問題全歸之於杜威的過錯(註八)，但是透過歷史的回顧則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過去被誤導的觀念。

由於對圖書館管理具有強烈的理念，杜威在 1883 年受到哥倫比亞學院圖書館委員會的青睞而進入該學院的圖書館(註九)，一展其講求效率而有計劃的經營概念，當時的確為該館注入一股全新而有效率的形象。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若要以有效的經營方式來管理圖書館，必須有大量素質一致的圖書館員，而最快的方式則是透過集體訓練。杜威是個不折不扣的效率專家，一切以速成為要，但是這種「速成」的觀念根本不可能造就理想的專業館員。

1875年以後，正值圖書館的規模及數量大量成長之際，迫切的需要圖書館員，加上應該讓女性進入大學就讀的聲浪高漲，哥倫比亞學院的校長巴納德(F.A.P. Barnard)向來主張應准許女性進入大學受教育(註十)，而杜威所欲設立的圖書館學校正好以「提供女性就讀最好的選擇」為訴求。因之，當杜威於1883年提出設立圖書館學校的計劃時，立刻得到巴納德完全的贊同。但是讓女性進入圖書館學校並不代表杜威懷著生而平等的理念，他只是認為女性很適合扮演他所認定圖書館員的角色。該校的委員會對於這一計劃遲遲未做決定。直到1886年雖然通過計劃，卻未給予設校的種種必要支援，以致於杜威和他的館員得辛苦的去搬些報廢的桌椅來充數，讓這個學校得以在1887年1月順利開課(註十一)。筆者認為這個圖書館學校得以在哥倫比亞學院成立，可說是受到時勢的推波助瀾。貝佛利(Lois Bewley)也認為，杜威在哥倫比亞學院成立第一個圖書館學校，以偶然的成份居多(註十二)。

這個圖書館學校成立的目的，在推動一個有組織的學術課程計劃，以實務經驗加上有系統的課堂講授。對於它居然可以隨著杜威轉移到紐約州立圖書館，海斯(R.M. Hayes)感到不可思議，並認為它的成功值得懷疑(註十三)。而這個學校的師資除了杜威之外，全是在圖書館所刻意訓練出來熟練而具有工作經驗的館員(註十四)。這種以圖書館員擔任圖書館學校老師的作法，也是這個學校走向以「實務」為訴求的主因之一。在沒有教科書、沒有教學法或課程表、沒有足夠師資的情況下，正式訓練就開始進行了(註十五)。

大學的成立有所謂大學理念，杜威欲成立圖書館學校，除了務實的提供當時圖書館的需求外，他的理念是什麼？依葛利森(Dee Garison)的看法，杜威在1888年向紐約州議員發表一席有關現代圖書館服務的演說，可能是其一生中最好的一篇演說，但是往後無論在哥倫比亞或阿伯尼(Albany)，他都沒有再談到有關圖書館學教育或圖書館員的理想。筆者甚至可以很肯定的說：杜威設立圖書館學校並非為了圖書館學或圖書館服務的理想，只是以制度化、機械化來達到效率的目標，杜威的辦學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走上以實務為訴求的這條路。他視圖書館和教會、學校為三位一體，沒有圖書館將失去指引、督導、啟發或支持(註十六)。

一個多世紀以來，杜威最受批評的莫過於其規則式的教學法(Prescriptive Teaching Methods)，只是為了培養優秀的工作人員，而不是創造

社會上及知識上的領導人才(註十七)。如果杜威當年能有較深遠的教育理念，而不是急於一時的成了實現巴納德男女合校想法的工具，是否能免於使圖書館學教育倒退 50 年(註十八)？杜威極為嚴重的公私不分及偏執、自負的性格(註十九)，和我們一向所認識的杜威實在有相當大的差距。事實上，杜威所關心的並不是我們的「專業」，而是他個人的「事業」，當時的有識之士對於設立這種圖書館學校就已感到憂心忡忡。但是筆者所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在百餘年前危機已然顯現，為何無法像同時期的其它學門順利的導入真正的專業？是不能耶？抑不為耶？

綜上所述，杜威所設立的圖書館學校的確有其歷史背景及社會需要，他的目的只是把圖書館學校當成訓練實務館員的場所。以當時的情況來看，確實已達到了這個目的。時代及社會的需求隨時在改變，杜威時代的圖書館學校是為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其所以有實務的趨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百餘年後的今日，社會的需求已有所改變，圖書館學校的教育模式仍脫離不了這個窠臼。嚴格說來，不論 19 世紀或近 20 世紀以來，圖書館學校一直處在低層次的職業學校或技術訓練學校(註二十)。如果圖書館學校的目標僅止於此，就讓我們從此不要再談專業知識或專業地位的問題，因為以杜威的模式是永遠不可能讓圖書館員達到專業地位的。

如同多位學者所言，杜威是一個獨斷的、沒有耐心的人(註二一)；是一名鼓吹者、熱心者及夢想家，而不是一個負責、可靠的工作者(註二二)；是一名倡導者，而不是學者，也不是教育家(註二三)。杜威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呢？

(二)「威廉森報告」(Williamson Report)的省思

在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史上，「威廉森報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於這份報告的提出，使得杜威時代在圖書館內設立圖書館學校的情況有了決定性的改變，圖書館教育從此走上學術的主體之中。但是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欲對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做一深入研究，也並非憑空想到的。其實早在 1916 年詹森(A.S. Johnson)就曾為卡內基公司做了一份研究報告，他指出當時的圖書館學教育只注意到技術的傳授。由於這篇報告，引起卡內基公司的注意，認為有必要對圖書館學教育做一深入的研究，而提供研究經費給威廉森，才有 1923 年「威廉森報告」的提出(註二四)。

威廉森是位經濟學博士，也是位熱衷於工作及學術研究者，由於具有經濟學的學識背景和對於書目及文獻的豐富知識，1911年得到哥倫比亞大學史力曼(Edwin R. Sligman)教授的推薦，到紐約公共圖書館擔任經濟及社會部門主管。其間曾離去就任教職，1919年再度回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經濟及社會部門。由於威廉森曾為卡內基公司進行過美國化研究(Americanization Study)，有機會和後來擔任秘書的伯傳(J. Bertram)談過有關卡內基的圖書館建築計劃，及對圖書館學教育的支持，因之威廉森個人認為，這是卡內基找他來進行這項調查研究的主要原因(註二五)。

1919年4月卡內基公司執行委員會授權，由威廉森和普特南(H. Putnam)等組成顧問委員會，共同研究圖書館學校的教育問題(註二六)。他以一位學者及非圈內人的眼光來看圖書館學校的經營，的確是切中要點。雖然席拉(Jesse H. Shera)批評這篇報告，只從圖書館學及圖書館員的觀點，而沒有從圖書館學及圖書館員應該如何做的方向來探討；只是企圖改進圖書館學教育，而不是要為圖書館學教育重新注入一股新血(註二七)。但是一直到今天，在探討圖書館學教育問題的研究報告中，其評價仍然在其它幾份報告之上(註二八)，它使得圖書館員脫離了學徒式的訓練方式。

70年後的今天，讓我們來看看當年經過詳細的調查、訪談之後，所發現及提出的幾點建議：

1. 專業及職員的工作界線不清：圖書館學校應該訓練專業，而把訓練職員的工作讓圖書館來做。
2. 圖書館學課程缺乏一致性，對主修及副修的科目應有標準。
3. 專業圖書館訓練應根基於大學教育；需要統一的入學考試標準。
4. 圖書館學校的教師多數不夠資格，應提供薪水聘較好的師資，同時需要全職教師及更多教科書；實習是很重要的。
5. 圖書館學校的許多缺點都根源於經費不足，薪水低無法聘請到好的師資。
6. 應該有獎學金以吸引更多的學生；不必再設立新的圖書館學校。
7. 圖書館學校應該成為大學的系所之一，維持其聲望、標準及優秀的人員。
8. 圖書館學校應提供二年的課程，第一年的專業訓練以一般原則及基礎

為主，第二年則進入專門化。

9. 必要以在職訓練，增進專業的成長及進步；可以發展函授學習。
10. 應有圖書館員資格認定及圖書館學校認可的標準。
11. 小圖書館應發展專門化的課程來訓練圖書館員。(註二九)

由於這份報告的提出，使得圖書館學校的問題受到廣泛的注意，而影響到下列幾項重大事件：

1. 圖書館學校從此全面脫離圖書館，納入其母機構——大學之中。
2. 卡內基公司因而在 1926 年提供經費，創立了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 (Univ.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擬使之成為研究及創造圖書館知識的園地。
3. 美國圖書館學會開始努力扮演「認可」(certification)的角色。
4. 編寫了十種重要的教科書。(註三十)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 1923 年「威廉森報告」提出後，雖然圖書館學校的隸屬已全面的轉到大學體制內，然而美國圖書館學校至今仍存在著 70 年前的問題：

1. 圖書館學系在學校內仍只是個小單位。
2. 修習課程的期限短。
3. 仍是女性的天下。
4. 學術成果少。
5. 由行政層次來看，並未成為大學的一部份。(註三一)

除此之外，有關圖書館員個人資格的檢定，也因為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權威機構來負責，而未能實現。因為依照過去的紀錄，美國圖書館學會並不適合擔任此一重大責任(註三二)。

(三)第一所以研究為導向的圖書館學校——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

威廉森在 1923 年所提出的報告中曾指出，當時的圖書館學校缺乏學術研究成果 (productive scholarship)。因此，1926 年卡內基公司提供 100 萬美元的經費給芝加哥大學成立了圖書館學校(註三三)，期望在芝加哥大學校園內建立一個研究圖書館學的學校。意圖將圖書館員的訓練帶到研究所教育的水準，同時發展圖書館學校所缺乏的學術 (scholarship) (註三四)，希望能使圖書館員獲得和哈佛法律學校及約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醫學院一

樣的專業地位(註三五)。

當時由芝加大學校長普騰(Ernest DeWitt Purton)負責籌設,所找的師資均來自非圖書館學領域,首任所長為沃克斯(George A. Works)。1932年起在威爾森(Louis R. Wilson)全力發展下,使得研究蔚為風潮。事實上,在1946年以前該校並未提供傳統圖書館處理及服務方面的內容。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當年成立的目的有四:

1. 強調基本原則,同時注意未來的技術在圖書館及專門中心內處理資訊的應用,以便讓學生能應用在圖書館學的專業實務上。
2. 讓學生能負擔起計劃未來圖書館及資訊系統的角色。
3. 透過理論的、歷史的、實驗的研究,來促進已成為紀錄之知識的溝通。
4. 提供圖書館學教育的哲學。(註三六)

威普斯(D. Waples)綜合建校當時,老師們在不同場合所提到該校的主要功能共有九項。他們認為該校最主要的責任是要符合其它研究所保持的學術及研究水準;而最主要的目的則是,研究如何擴展有關圖書館的價值,及現存的知識本體中相關的作業程序,並且發展可以獲得重要數據、測試及應用的研究方法。此外,在其它各點中均重複提到探究基本問題、探究的精神、服務的研究等(註三七),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不但要求老師進行研究,同時也要求學生要有研究能力。

對圖書館學教育而言,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帶給我們許多東西:一股批判研究的新風氣、追尋基礎問題的答案、把圖書館學當做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學生一定要有適當的專門學科背景、由芝加哥大學其它學系的老師指導博士生進行研究。或許最重要的是,它帶來一種新的活力、一種對於學術的奉獻(註三八)。

1988年這所代表著學術象徵的實體亦劃下了休止符(註三九),這個震撼不禁令人再度回顧過往的足跡,我們是否走錯了路?或是圖書館學根本還沒有準備好走向學術這條路(註四十)?對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的關閉,懷特(Herbert S. White)的感言很能夠引起筆者的共鳴,他說:「芝加哥大學代表著圖書館專業教育的一種哲學、一種趨向及一種標準,失去了它猶如失去了和我們自己的歷史中最重要部份的連繫。」(註四一)

四美國圖書館學會的認可制度

認可制度的產生，可溯自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由於杜威學徒式訓練方式已成為許多圖書館學校的模式，使得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決定成立圖書館訓練委員會 (Committee on Library Training)，來監督及評鑑這些圖書館學校的素質。但是這個委員會所提出的第一個標準，卻很難反映出圖書館學校在學術方面的好或差。1915 年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 AALS) 也成立了，但是對於「學術」這部分的認定標準仍無多大進展。

由於威廉森報告對於圖書館學校教育的內容有所批評，也促使卡內基提供經費給美國圖書館學會，於 1924 年成立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 (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BEL)，來促進圖書館學教育(註四二)，並著手制定圖書館學校標準。1926 年圖書館教育委員會所制定的標準，曾用來做為成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的依據。到了 1933 年在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及圖書館教育委員會兩個單位合作努力之下，提出圖書館學校最低需求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s)，但是這個標準提出後近 20 年未修訂過。1951 年 7 月 15 日美國圖書館學會通過了「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註四三)，使得原來准許非大學程度之學生就讀的第三類型 (Type III) 圖書館學校無立身之地(註四四)。

1965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自威爾森基金會 (H.W. Wilson Foundation) 得到一筆為期六年的獎助金 75,000 美元，而在 1966 年成立了圖書館學教育處 (Office for Library Education, OLE)，從此以後，圖書館員教育成了美國圖書館學會所高度關切的重點(註四五)。這筆獎助也同時讓該學會得以修訂 1951 年的認可標準，成為 1972 年的認可標準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72)(註四六)。這個認可標準又使用了 20 年才又重新加以修訂(註四七)。

1956 年成立的認可委員會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COA)，取代了原來的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註四八)，專門負責有關圖書館學校認可事宜(註四九)，其目的在了解，提供專業學位所預備的課程內容是否符合專業的目標？其認可的項目有三：

1. 只針對專業學位課程，未考慮大學部或繼續教育、博士課程等。
2. 只針對課程，而非整個學校或機構。
3. 只是認可而不是對個人資格的檢定。(註五十)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認可制度是想要透過教育來增進圖書館員的服務(註五一)。這也意味著認可圖書館學校的課程，只保證這個課程可以訓練合格的專業館員，但並不保證所訓練出來的一定是合格的專業館員。

認可標準主要在提供有興趣發展專業課程之圖書館學校一項質的指引，它所評估的項目有六：1. 圖書館學校課程的目的及目標；2. 課程的內容；3. 師資；4. 學生；5. 管理、行政及經費；6. 外部資源及設備(註五二)，同時這種認可制度是採取自願參加的方式(註五三)。但是認可的時機通常是在課程已經實施了很長一段時間，學生也已經畢業許久之後才進行(註五四)，因之它的合適性令人質疑。但是由於認可的結果會影響到註冊學生人數，及圖書館學校和行政當局的關係，因此美國的圖書館學校均相當重視此一制度。此外，它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把研究列入評鑑項目之中，對於把「質」的評鑑列為重點的認可制度來說，這實在是一大諷刺。

大學的各學系通常把教師的著述或研究列為重要的評鑑指標，認可委員會雖然在 1978 年把教師的著作列為需求之一，但並沒有任何一個學校因為教師的著作較少而受到否決。不管對於學術或著述都缺乏明確的定義，因此貝斯萊(K.E. Beasley)說：認可委員會無法使教授的研究量增加(註五五)。

其實認可制度是否能改進圖書館學校的品質，完全看各個大學是否把圖書館學校的卓越(excellent)當做一回事，如果學校當局不認為這是很重要的，當然不會提供足夠的資源，如此就無法改變圖書館學校的情況。同時，假如實務工作者也不在乎認可制度，那麼學會就應該停止這種控制研究生素質的方式了(註五六)。

海斯認為在未來認可標準應該加強的有：1. 整合自動化到課程內；2. 提高入學許可的條件；3. 延長修業年限；4. 加強專門化；5. 擴大應用的領域；6. 增強專門學科的知識；7. 著重管理；8. 重視研究。由於實務工作需要界定問題的能力、需要取得所需資料以解決問題的能力、需要組織這些資料來協助解決問題的能力。因之，海斯認為應該重視研究，才能夠讓館員在服務讀者、管理及做相關決策時有所依據(註五七)。

席拉認為圖書館學教育最嚴重的失敗，是無法提出能評量所謂學術卓越(academic excellence)的標準，而認可制度只是由下而上的作業程序。他批評認可委員會不能有效的仔細探究，只是憑著一些書面資料來評量；不能提

出根本的問題，而只是憑著模稜兩可的成立宗旨及目標來評鑑圖書館學校是否優良(註五八)。如果不接受認可，會使大學行政主管對於圖書館學校是否有必要存在產生疑問，但是接受認可又不能保證其未來。紐約州立大學吉尼索分校(SUNY at Geneseo)的圖書館學校就在重新得到認可之後宣告關閉(註五九)，認可的意義著實令人質疑。

二、圖書館學校教育的盲點

自從杜威在 1887 年創立了第一所圖書館訓練學校以來，圖書館學校的教育目的就一直呈現著不確定的情況，一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一片混沌。圖書館學校是以「訓練」夠資格的圖書館員為目標之一，然而圖書館卻對其訓練出來的準館員不滿意；圖書館學校以「教育」專業的館員為目標，卻又往往被圖書館譏為理論派。這一矛盾現象就足以陷圖書館學校於一百多年的泥淖之中，終至走上被關門的命運。這一切可以歸咎於經濟、政治嗎？筆者並不以為可以如此輕易的把真正的責任推給歷史。

一般認為，威廉森報告的提出，是圖書館學校教育的第一個分界點，使得圖書館學教育脫離了學徒式的訓練方式(註六十)，正式進入了大學教育的殿堂。總以為從此可以名正言順的游走於學術領域之中，但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圖書館學的教學內涵並未因為進入學術領域而有所根本上的改變(註六一)，以至於在 1960 年代以後，雖然再度引進新科技來強化圖書館學校及圖書館的地位，然總敵不過各門學科的原創者。這種表面化的借用其它學科的結果，在遇到更強有力的對手時，弱點就很容易暴露出來了。

有關圖書館學校的目標不確定，以及圖書館學教育者的矛盾心理，可以從許多探討圖書館學教育的文獻及調查報告中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下面就幾個未定的現象加以探討，每一位從事圖書館學教育者及圖書館員都有責任去深思這幾個問題。我們是否都已經掌握了明確的方向？如果還沒有，為什麼沒有？是否存在著什麼問題？該怎麼辦？

(一)目的何在？專業或職業？

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可標準的第一項，即是要求各圖書館學校詳列其任務、目的及目標，以當做評估是否達到教育成果的依據。此一要求不僅可反映

出這個學校的原則及基本特色，同時也可反映出：1. 圖書館及資訊研究之哲學及重點；2. 該學科領域專門化的可能性及對於想就讀圖書館學校者之需要的敏感度；3. 其它領域和圖書館及資訊研究彼此間的貢獻；4. 圖書館及資訊服務在多元化、技術化及整個社會中角色的改變(註六二)。

圖書館學校的教育者有多少人可以明確而自信的說出其設立的目的何在？如果目標不明確或是幾個目標根本互相抵觸，例如：既要培養優秀的館員又要培養高級的研究人員，事實上這兩種人才所要學習的內容是大不相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能夠達到目標？只有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所有的課程規劃、課程內容、延聘師資等才能順利進行，否則必導致所教育出來的學生無所適從。

杜威認為透過課堂的教導，再配合圖書館的實務工作，是培養圖書館員最好的方法(註六三)。他創立的第一所圖書館學校是名副其實的圖書館工作的訓練學校——圖書館經營學校(Columbia Library Economy School)。筆者覺得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以訓練圖書館員為主，其導向是職業化的。如果圖書館學者有意使得這門學科成為真正的學門，那麼使用圖書館學校(Library School)這個名稱是否為一本根本上的錯誤？它使得圖書館學教育無可救藥的走上職業訓練之途，雖然想要發展為專業，但是經過了百餘年仍是遙無指期？

使用圖書館學校這個名稱固然限制了圖書館學的發展，但是改為圖書館科學(Library Science)或加上了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甚至改為資訊研究(Information Studies)，也都無濟於事。因為只要有訓練圖書館員的目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機會使得圖書館學教育成為知識累積的起點。那麼我們是否就因此而罷休？

圖書館研究所的教育目標是在提供研究生適當的知識及技巧，使其能夠成為令人滿意的專業圖書館員(註六四)。圖書館教育的課程是應當有所改變，但是由一個學校又一個學校，一門課程又一門課程的去修訂，不會達到任何一所圖書館學校的真正目的，我們需要的是訂立我們教育目標的分類體系(註六五)。

專業是我們的訴求，但是針對著就業市場的需求，我們圖書館學教育卻又無法避免的走向職業化，基本上專業是排斥職業化的，而職業化的教學內

容講求立即可以用上，及完全以市場的需要為其指標，如此是不可能造就專業人才的。圖書館學校的目標何在？有多少人去深思這個問題？我們的課程是依著這個目標在規劃嗎？

哈金斯(R.M. Hutchins)認為職業化(vocationalism)會導向瑣碎及孤立，不但對大學不好，同時亦有損專業(註六六)。但不可諱言的，如今圖書館學校正是走向職業化這一途，對於熱衷追求專業地位的館員及教育者，哈金斯的話是否讓我們有所警惕呢？

(二)教些什麼？誰來教？

到底圖書館學校要教些什麼？史都特(Robert D. Stueart)引用了胡列(Cyril Houle)的一段話，筆者覺得用來描述圖書館學校面臨到底要教些什麼的困境十分傳神。他說：畢業五年的校友認為應該多學些實用的東西，畢業十年的校友則認為應該多教些基本理論的課程，畢業十五年的則說應該多教點行政及人際關係，畢業二十年的則認為應該多教點歷史、社會、經濟方面的課程，等到二十年後他們又說應該對所有的知識、學科及人文等都要有廣泛的引導(註六七)。因為畢業的年限不等，接觸到圖書館不同層次的工作，而令他們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這也足以說明，面臨到底該排些什麼課程才能使得學生能成為合格的館員時，圖書館學校是多麼難以決定。

圖書館學教師所面臨的為難處，沒有比柯尼(Michael E.D. Koenig)的比喻更貼切了，他說：圖書館學校好比是把一小團奶油塗在一大片土司上，所要學的內容上自古文書的知識，下至專家系統與人工智慧，這不是圖書館學校一小羣教師所能辦到的(註六八)。但是圖書館學校的教師既是一學術人員，則有責任從事研究及擴展領域內的知識本體，而且要傳達這些知識，以啟發圖書館員對於專業產生不平凡的抱負；同時在傳達的過程中，一定要包括對於這些知識及其實際的開拓持著批評及質疑的態度。雷瓦德(W.B. Rayward)很懷疑的問道：圖書館學校的畢業生回想起過去的許多老師中，有多少是符合此一準則的(註六九)？

到底要學習及增進服務專業的思想內涵？或是學習及增進實現這些思想的技巧？兩者之間的掙扎，從杜威當時遺留到現代(註七十)。杜威創立圖書館學校的想法及訓練方法所引發熱烈的爭論，正象徵著對於專業教育內容分歧的意見一般，延續至今尚未停止(註七一)。而種種爭論並未帶來實質上的

改進，只是導向更嚴重的「不確定」，這樣的情況對於圖書館學教育的影響絕對是有害的。

科技的進步、高等教育的財務危機，及發現館員的技術和知識可應用到工商業界，這些現象使得許多圖書館學校均力求改變以求生存，而爲了要適應工商業界大量應用電腦儲存及檢索資料的需求，有些原來的核心課程就被視爲沒有必要，因之圖書館教育已失去了「圖書館」的這一個部分(註七二)。對於專業學校爲了迎合就業的需要而教一些實務性的課程，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哈金斯，在超過半個世紀以前就曾指出，實務是日日在變化，時時在變化，即使老師能授予學生跟得上時代變化的內容，但也無法保證當學生要運用時仍然符合潮流(註七三)。如果圖書館學校不應該只教些實務，可是關於理論我們又懂得多少呢！

所謂理論是指圖書館學所據以實行的理論、原則及方法，而實務則是圖書館內的工作、服務等。在圖書館學這個領域中，理論與實務這個話題就像一個栗子已被炒了不下千餘次，卻從來沒有裂開來過(註七四)。實務與理論之間到底要如何取得平衡點？有可能取得平衡點嗎？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解答。

實務的課程主要在教如何做，對圖書館服務而言是很重要的，然而所以要教理論，則是因爲運用理論可以闡釋實務、可以增進實務，而理論的增進則需藉由研究及發展。因之，假如能夠在課程中加些理論的研究，或許可以吸引學生成爲教師或研究者，而不是只是去當一名實務工作者(註七五)。

可是，目前課程內容所呈現的情況，就像皮爾斯(Sydney J. Pierce)所說的，由於我們給圖書館學校學生太多的規則、訓戒、政策，不但未能使之由經典之作中產生知識的刺激，而且無法向學生們揭示，過去對於問題討論的結果都是經過仔細思考且具智慧的回應。其它學系在發展專才(specialty)之前，必修課程是用以顯示出不同領域的基礎所在，但是皮爾斯卻發現他所調查的 24 所圖書館學校之中，無一所在課程介紹中提到要求學生應閱讀經典之作；在 19 所圖書館學博士課程中，有九所並沒有列必修課程(註七六)。對於一心想達到學術及專業地位的圖書館學界人士而言，什麼樣的課程及什麼樣的教材才能幫助我們達到所欲追求的目標？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課題。

由於圖書館學校的教師在理論方面均很弱，因之課程也都缺乏理論的研究，所以教育出來的學生也很少成為教師及研究人員，甚至在博士階段也是如此。史汪(R.C. Swank)認為只因對方沒有圖書館學學位或沒有圖書館工作經驗，我們可能拒絕了其它領域許多具有研究導向的人來讀博士班，其實我們應該聘他們來當老師的(註七七)。如果圖書館學校的老師沒有把教學當做是研究的延伸，而只是以教學來取代研究，那麼不可避免的，必然只會強調實務的技巧及專業職位的需求。所教的內容就是圖書館在做些什麼，而不是有關圖書館學或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方面，到底有那些是我們所知道的及不知道的。如果這樣的課程再延伸到博士班，必然會導致危機(註七八)，教學內容及師資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具有好的教學能力、樂觀的個性、有出版品、在專業學會有良好的服務紀錄，是理想之圖書館學校教師的基本條件，但是有些學校的政策則認為還需要具有博士學位及有在從事研究。羅斯坦(S. Rothstein)則認為圖書館學校雖然需要具有博士學位者，但是這並非必要條件，有多少年實務經驗及其教育背景無關緊要，因為我們最在意的應該是內涵而非外在(註七九)。誠如一羣圖書館學校的畢業生所言，圖書館學校的老師應該多和圖書館保持連繫，而不要只是知道一些由同事或是專業期刊上刊載的內容，同時圖書館學校也沒有必要聘請一些在圖書館界的著名權威人士來授課，因為他們未必是優秀的老師(註八十)。

圖書館學校成立的目的必然會影響到其聘請的師資，如何由學科更多元化的師資來吸引學生？到底擁有圖書館工作經驗重要？或是具備啟發研究動機的能力較重要？這些答案均和圖書館學校設立的目標有關，問題是我們是否已確定好了方向？

(三)學習多久才足夠？

因為圖書館學校太小而導致發展困難，這是自從1923年以來只要是探討圖書館學教育之問題時，均會一再被提到的缺陷。事實上，學校小及教員少導致另一更深入的問題就是課程太短。短暫的時間不可能讓老師能以較有系統的方式，來引導學生了解研究的價值及報酬，或使學生產生在學術上更進一步研究的動機(註八一)。由圖書館學的歷史來看，自始以來，大家對於圖書館學校研習時間的長短就一直無法取得一致的看法。

1887年杜威在哥倫比亞學院成立圖書館學校時，所招收的第一批學生原定修習期限僅有三個月，後來「應學生要求」延了一個月。等到四個月課程結束之後，這20位學生有半數以上決定要留下來繼續第二年的課程。第二年課程原來只預定七個月，後來又延為整個學年(註八二)。任何一門專業，學習年限應該依照欲達成目標所需的時間來決定，杜威的圖書館學校對於修業年限的「不確定」，已隱約呈現這所訓練學校對訓練一位專業館員到底該給多少專業知識，根本「毫無概念」。而到目前為止，圖書館學界對於修業年限及修業內容的不確定，所帶給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含意呢？

1926年哥倫比亞大學正式接納了當年「移居」至阿伯尼紐約州立圖書館的圖書館學校，加上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的併入，成立了圖書館服務學校(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計劃中的兩年研究所課程，第一年為基礎課程，只是資格認定；第二年才提供更專門的課程，包括圖書館學的進階課程及學校內的其它課程(註八三)。這種讀兩年才有碩士學位的學制和現在兩年整合課程(Two-Year Integrated Program)的碩士學制其實不一樣(註八四)。

但是這種學士後第一年研習結束只授予學士學位的方式，在1940年代受到學生不滿的壓力，他們認為應該得到的是碩士而不是學士學位。1947年丹佛大學圖書館學校率先採取行動，宣佈第五年課程可取得碩士學位，該校並得到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BEL)的認可，迫使美國圖書館學會在1948年宣佈圖書館學校所授予的第一個專業學位為碩士學位(註八五)。德威爾(Arlene T. Dowell)在追溯圖書館學校兩年制碩士學位的歷史時發現，其實早在1941年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及1945年哥倫比亞大學就已宣佈第五年課程授予碩士學位了(註八六)。

對於這種從兩年專業課程變成一年的情形，艾凡斯(G. Edward Evans)曾仔細研究1924年至1928年間，美國大學學會高等學術及專業學位委員會(Committee on Highe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寫給美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BEL)的幾份報告，他發現有關圖書館學的訓練及學位授予的方式，這個學術及專業學位委員會曾做過非常明確的建議，其中包括：

1. 進入專業圖書館學課程者，必須是主修人文或科學之大學四年級畢業

生。

2. 兩年的專業研習期間，以第一年學習圖書館學專業的學科，第二年才進入嚴格的研究所主要部分，如此才能取得人文學或科學碩士學位 (M. of Arts)。

3. 不贊成圖書館學學士或圖書館學碩士學位的授予。(註八七)

但是美國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去修改、忽略，及瞞過這些建議事項。事實上修業一年就取得碩士學位，根本不在美國大學學會(AAU)的考慮範圍之內(註八八)，也就是說他們所認定的「專業」，是二年的研習時間而不是一年。由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伊利諾大學及加州伯克萊大學的幾個專業學科，如：社會工作、商業行政、建築、法律、教育等來看，除了哈佛及密西根的教育學碩士只要一年研習時間之外，其它都要求大學部所學為一般學科或是專業訓練至少兩年以上(註八九)。這種修業年限不但影響到圖書館學專業的認定，同時也影響到圖書館學在研究所、學術界或專業界的地位。當筆者從圖書館史的文獻中獲知所謂「專業」的真象時，的確受到很大的震撼，但是以目前的現實環境，想要有所突破實在十分困難。

兩年的碩士學位課程使得學生有較充裕的時間學習更專門的內容，及有機會到圖書館實習。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t UCLA)是美國第一個採取二年制碩士課程的學校(註九十)。該校的海斯(R. M. Hayes)教授肯定兩年的學習期限有其必要，而且發現申請入學的水準因而提高，對教師而言，因為開授專門的討論課而增進其研究及專業的興趣(註九一)。

德威爾則認為兩年制課程最終的受惠者是圖書館，由於學生了解決策的過程及如何做決策，使得他們在受圖書館僱用之後，能很快的負起責任來(註九二)。但是索瑪斯(F. William Summers)教授則不以為然，他認為延長年限只是增加學生的學費負擔，除非可以確定延長時間能夠培育較優秀的館員，能夠使僱主更願意付較多的薪水僱用他們，而不是以有經驗為考慮的條件，否則只是對圖書館學校有好處，而不是對學生有好處(註九三)。他們兩位的看法，正可以說明圖書館學校訓練一位專業館員的年限該有多久，大多數人的看法不是從「專業」的準備，竟然是極為表面化的「市場」需求及「顧客」導向。

由於第五年課程過於強調實務，只能教一些基礎課程，因而有的學校就有了所謂第六年課程的制度，提供一些已修畢第五年課程，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有必要再進修的館員就讀。史汪認為無論是為了服務而教育或是為了研究而教育，欲使圖書館服務專門化，第六年制的課程的確有其必要(註九四)。更有些學校為了適應增加新教材的趨勢，將第五年課程延長為18個月，但是課程的延伸並未解決問題。因為我們很痛苦的發現所謂合格適任的能力，在短時間內又過時了，因而可能無法有效配合新的服務對象及新技術的需要(註九五)。如果延長修業年限也不能解決問題，很顯然的，我們並沒有針對問題的重心所在來思考。

令圖書館學校感到為難的是，想要延長修業年限又怕造成負面效果，老師們擔心館員的薪水低、地位低，如果修業年限改為兩年，學生恐怕不願意來就讀(註九六)。果真如老師們所預料的，「柯能報告」(Conant Report)的調查顯示，只有19%的學生認為應該延長修業年限，但是奇怪的是竟有70%的學生沒有表示意見(註九七)。其實隱含在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到底應該唸多久的背後，主要的問題在於：如果教育的要求(educational requirement)是達成「專業」的標準之一，那麼應該讓這些準專業人員學些什麼？它在教育層級體系中應該定位在那裡？專業的教育應該定位在研究所的層次，而教育的年限應該依照教育的內容來決定。以專業地位已受到完全認同的醫學及法律來看，其研究所的修業年限均超過三年。除此之外，專業的內涵、理論的知識及專門化的內容，則是專業的另一基本要求(註九八)。

席拉亦認為只有一年修業年限，對於培養具專業基礎及專業能力的人才並不恰當(註九九)，但是到1989年在美國也只有三所圖書館學校實施兩年制碩士課程，即華盛頓大學(Univ. of Washington)、北卡羅萊納大學查珀希爾分校(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註一〇〇)。

兩年的修業年限勢必使學生花費更多，卻不能保證他們所得到的薪水高於一年制的碩士生(註一〇一)，這是令圖書館學教育者感到十分為難之處。但是長久以來，一年的修業期限卻使我們不被其他專業所認同。其實除了修業年限不夠久之外，圖書館學教育所面臨的還有更多更棘手的困境，這部分將在下面提出討論。

(待續)

附 註

註一 Dee Garrison, "Melvil Dewey: Mission and Mechanics," In *Apostles of Culture: The Public Librarian and America Society, 1876-1920*.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p. 132-135.

註二 賴鼎銘,〈美國圖書館學研究所為什麼關門?〉政大圖資通訊, 2(民國81年8月), 頁3。

註三 Jesse H. Shera,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Becker and Hayes, 1972), p. 230.

註四 同註三, p. 229.; 及 W.B. Linderman,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5, eds. Allen Kent and Harold Lancour. (New York: M. Dekker, 1971), p. 379.

註五 M. Biggs, "Who/What/Why Should a Library Educator B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5 (Spring 1985), p. 62.

註六 D.G. Davis,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Library Trends*, 25(July 1976), p. 115.

註七 同註一, p. 115.

註八 L. Bewley, "Library Education Reache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ts 100th Anniversary," *Canadian Library Journal*, 44 (Aug. 1987), p. 213.

註九 同註一, pp. 127-128.

註十 同註一, pp. 132.

註十一 同註一, p. 130.

註十二 同註八, p. 214.

註十三 R.M. Hayes, "Accreditation," *Library Trends*, 34 (Spring 1986), p. 538.

註十四 F.L. Miksa. "Melvil Dewey: The Professional Educator and His Heirs," *Library Trends*, 34 (Winter 1986), p. 373.

註十五 同註五, pp. 265-266.

註十六 同註一, p. 136.

註十七 Marion Paris and Herbert S. White, "Mixed Signals and Painful Choices: The Education of Special Librarians," *Special Libraries*, 77 (Fall 1986), p. 207.

註十八 B.W. Rayward, "Melvil Dewey and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3 (Oct. 1968), p. 311.

註十九 同註一, p. 107.

註二十 W.B. Rayward, "Conflict, Interdependence, Mediocrity: Librarians & Library Educators," *Library Journal*, 108 (July 1983), p. 1314.

註二一 同註八。

註二二 同註一, p. 118.

註二三 同註三, p. 234.

註二四 J.H. Shera, "The Aims and Content of Graduate Library Education," In *Targets for Research in Library Education*, ed. Harold Borko. (Chicago : ALA, 1973), p. 11.

註二五 P.A. Winckler, "Williamson, Charles C.,"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33, eds. Allen Kent & Jay E. Daily. (New York : M. Dekker, 1982), pp. 153-155.

註二六 C.C. Williamson, "Training for Library Work." In *The Williamson Reports of 1921 and 1923*. (Metuchen ; N.J. : Scarecrow Pr., 1971), p. 5.

註二七 同註三, p. 239.

註二八 S.K. Vann, "Conant and Williamson : A Review Article," *Library Quarterly*, 51 (Oct. 1981), pp. 429-436 ; L.W.S. Auld, "The King Report : 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 48 (Apr. 1987), pp. 174, 176-179 ; R.M. Hayes, G.B. Neaville and L.S. Estabrook, "The King Report on Library Education : Three Perspectives," *Library Quarterly*, 57 (Oct. 1987), pp. 426-435 ; and H. White, "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2 (Jan. 1987), pp. 373-374.

註二九 C.C. Williamson, "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Williamson Reports of 1921 and 1923*. (Metuchen, N.J. : Scarecrow Pr., 1971), pp. 136-146.

註三十 這十種教科書為 :

1. Waples, Douglas. *Investigating Library Problems*.
2. Waples, Douglas and Tyler, Ralph W. *What People Want to Read About*.
3. Joeckel, Carleton B. *The Govern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4. Wilson, Louis Round. *The Geography of Reading*.
5. Wilson, Louis Rouds and Tauber, Maurice 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6. Randall, William Madison. *The College Library*.
7. Thompson, James Westfall. *The Medieval Library*.
8. Butler, Pierce.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9. Butler, Pierce.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10. Joeckel, Carleton B. and Carnovsky, L. *A Metropolitan Library in Action*.

註三一 C.D. Hurt,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 A Crossroads for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16, ed. by Irene P. Godden. (San Diego : Academic Pr., 1992), pp. 158-159.

- 註三二 W.R. Eshelman, "The Erosion of Library Education," *Library Journal*, 108 (July 1983), pp. 1312.
- 註三三 C.M. Whit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Education: Problems and Progress to 1951*.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 1976), p. 231.
- 註三四 同註二十, p. 1314.
- 註三五 A. Bohannon, "Library Education : Struggl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ofession,"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7 (Sept. 1991), p. 216.
- 註三六 L. Carnovsky and Don R. Swa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4, eds. Allen Kent and Harold Lancour. (New York : M. Dekker, 1970) , pp. 540-541.
- 註三七 D. Waples,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Chicago," *Library Quarterly*, 1 (1931), pp. 26-27.
- 註三八 J.H. Shera, "Failure and Success : Assessing a Century," *Library Journal*, 116 (June 15, 1991), p. 6.
- 註三九 M. Paris, "Library School Closings : The Need for Action," *Library Quarterly*, 61 (July 1991), p. 261.
- 註四十 同註三一, p. 160.
- 註四一 "Librarianship Out, Information Studies in at Chicago's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merican Libraries*, 20 (March 1989), p. 182.
- 註四二 P. Sullivan, "ALA and Library Education : A Century of Changing Roles and Actors, Shifting Scenes and Plot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6 (Winter 1986), p. 147.
- 註四三 同註十三, pp. 538-539.
- 註四四 同註四二, p. 148.
- 註四五 L. Asheim, "Trends in Library Education : United Stat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5, ed. by Melvin J. Voigt. (New York : Academic Pr., 1975), p. 148.
- 註四六 同註四五, pp. 154-155.
- 註四七 C.A. Bunge. "Accreditation,"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Today*. (Chicago : ALA, 1991), pp. 61-62.
- 註四八 H.L. Totten, "Accreditation of Library Educational Programs,"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11 : 3/4 (1989), p. 6.
- 註四九 同註四五, p. 152.
- 註五十 同註十三, pp. 540-541.
- 註五一 同註四八, p. 7.
- 註五二 H.S. White, "The Library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Process : A Retreat from Insistence on Excellence," *Library Journal*, 105 (Nov.15, 1980), p. 2377.
- 註五三 同註四八, p. 5.

- 註五四 同註四八, p. 9.
- 註五五 K.E. Beasley, "Issues in Library Accredit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5 (Fall 1984), pp. 76-77.
- 註五六 同註五二, p. 2382.
- 註五七 同註十三, pp. 552-556.
- 註五八 同註三八。
- 註五九 E. Dyer and Daniel O'Connor, "Crisis in Library Education,"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57 (June 1983), p. 862.
- 註六十 同註三, p. 239.
- 註六一 同註二四, p. 15.
- 註六二 G. Evans, "Library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Its Importance to the Canadian Library Community," *Canadian Libraries*, 48 (Apr. 1991), p. 105.
- 註六三 H. McMullen, "Library Education, A Mini-History: What Hath Dewey's Daring Venture Wrought?" *American Libraries*, 17 (June 1986), p. 406.
- 註六四 同註二四, p. 9.
- 註六五 J.J. Boll, "A Basis for Library Education," *Library Quarterly*, 42 (April 1972), pp. 197-198.
- 註六六 R.M.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 Pr., 1962), pp. 43-44.
- 註六七 R.D. Stueart, "Great Expectation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Library Journal*, 106 (Oct. 15, 1981), p. 1989.
- 註六八 M.E.D. Koenig, "Buttering the Toast Evenly," *American Libraries*, 21 (Sept. 1990), pp. 723.
- 註六九 同註二十, p. 1315.
- 註七十 同註十四, pp. 378-379.
- 註七一 同註六, p. 116.
- 註七十二 P. Wilson, "Taking the Library Out of Library Education: Shall We Change Our Name?" *American Libraries*, 12 (June 1981), pp. 321-322.
- 註七三 同註六六, pp. 48-49.
- 註七四 R.C. Swank, "Sixth-Year Curricula and the Education of Library School Facultie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8 (Summer 1987), p. 15.
- 註七五 同註七四, p. 16.
- 註七六 S.J. Pierce, "Dead Germans and the Theory of Librarianship," *American Libraries*, 23 (Sept. 1992), pp. 641-642.
- 註七七 同註七四, pp. 16-17.
- 註七八 同註二十, p. 1317.
- 註七九 S. Rothstein, "The Ideal Faculty Member: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7 (Fall 1966), pp. 66-69.

- 註八十 “What’s Wrong with Our Library Schools?” *Library Journal*, 91 (Apr.1, 1966), p. 1774.
- 註八一 同註二十, pp. 1316-1317.
- 註八二 同註四, p. 372.
- 註八三 同註四, p. 380.
- 註八四 A.T. Dowell, “The Two-Year Master’s: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8 (Spring 1978), p. 325.
- 註八五 W.Z. Nasri,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7, eds. Allen Kent & Harold Lancour (New York: M. Dekker, 1972), p. 425.
- 註八六 同註八四, p. 327.
- 註八七 G.E. Evans. “An Historical Note Relating to Library Degrees and the Two Year Program,”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1 (Spring 1971), pp. 314-315.
- 註八八 同註八七, p. 322.
- 註八九 同註八七, pp. 309-311.
- 註九十 同註八四, p. 330.
- 註九一 R.M. Hayes and F. William Summers, “Two-Year Library School Programs: Useful Extension or Waste of Time?” *American Libraries*, 14 (Oct. 1983), p. 620.
- 註九二 同註八四, p. 334.
- 註九三 同註九一, pp. 619-620.
- 註九四 同註七四, p. 18.
- 註九五 同註六七, p. 1990.
- 註九六 R.W. Conant, *The Conant Report: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of Libraria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 1980), p. 55.
- 註九七 同註九六, p. 96.
- 註九八 J. Robbins-Carter and Charles A. Seavey, “The Master’s Degree: Basic Preparation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Library Trends*, 34 (Spring 1986), pp. 567-569.
- 註九九 同註三, pp. 372-373.
- 註一〇〇 同註四八, p. 22.
- 註一〇一 同註八四, p. 332.